

註釋：

¹除了 CO 129 外，歷史檔案館從英國公共檔案館購買的檔案尚包括下列各檔案組別中有關香港的部份：

- (i) CO 349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 Hong Kong Register of Correspondence 1849 – 1952);
- (ii) CO 403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 Hong Kong Entry Books 1843 – 1872);
- (iii) CO 489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Register of Out-Letters 1872 – 1926);
- (iv) CO 537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s: Confidential General and Confidenti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759 – 1955);
- (v) CO 882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Eastern 1847 – 1952);
- (vi) CO 885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Subjects Affecting Colonies Generally, Confidential Print 1839 – 1966)

²香港大學洗玉儀在 1997 年曾編製了一個 CO 129 的電腦化索引，令使用這批檔案更為方便。見 Elizabeth Sinn, *Index to CO 129 (1842 – 1926)* [computer file] (Hong Kong: History Dep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Index to CO 129 (1926 – 1951)* [computer file] (Hong Kong: History Dep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後者更可透過互聯網頁查閱 (網址：<http://www.catholic.org.hk/co129/>)。

³香港大學圖書館亦藏有這三個檔案組別的縮微膠卷。根據該館電腦藏書目錄(<http://library.hku.hk/search>) 的顯示，這三個檔案組別所包含的案卷數量分別是：CO1023 – 33 個；CO 1030 – 327 個；CO 131 – 16 個。從數量上比較，歷史檔案館新購的 CO 1023 比港大圖書館所收藏的案卷少 1 個，CO 1030 比該館多 29 個，至於 CO 131 則多 14 個。

⁴Norman Miners, “Notes on the Hong Kong Record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London.”，載王廣武主編《香港研究資料叢刊》(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三聯書店，1999 年)，頁 125 至 133。

⁵首四卷是行政局和立法局會議文件的合編。

東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利用

楊寶霖

東莞中學

一、搜集

我在東莞地方文獻方面，搜集的範圍很廣，包括：詩文別集、方志、俗文學、碑刻、族譜、家乘、方言之書、農業。

我搜集的目的，不是想做收藏家，而是研究所需。搜集的內容，是我研究的內容。在研究畛域分明，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的今天，未免為專家所笑。有志者，都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來決定前進方向的。本人不在科研單位，一無經費，二無公置資料，三無助手，含苦茹辛，廢寢忘食，寫出一本專業的著作來，像我

這樣的人，出版社會出嗎？自己所處的環境，要出書，只能游說有識的而不計經濟效益的民營企業家，或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出資者必根據自己的興趣與需要，作出投資的選擇。如《農史論文集》之類，他們是不感興趣的。本人以前是在華南農業大學研究中國農史的，全國只有三份農史雜誌、季刊或半年刊。一年能用你幾篇呢？何況雜誌大都論資排輩。所以我只能雜。況且學科與學科之間，是有聯繫的，不同的學科，可以互補。當然，雜，不能專攻，精力分散，成就不大，成不了家。但我不是自

幼出家，未經剃度，沒有袈裟度牒，不是某高僧弟子，又不在名寺修行，自知修不成正果，作一野狐禪。吾願足矣。

搜集地方文獻，其艱苦情況，非局外人所知。一個小地方的文獻，極少有公家搜集與收藏，只能自己動手。我為抄碑，東莞遠近近近荒山野嶺，都留下我的足跡；為讀莞人遺集，訪遍了故家遺老；為得族譜，凡聞有藏者，即騎車前往，托親友，輾轉引線，不得讀不止。流出海外的東莞的珍本秘籍，在好友的鼎力成全下，也進入我的自力齋，再通過各種途徑，把它影印出來，為世所用。如：

【康熙】《東莞縣志》，國內無傳本，藏日本內閣文庫，1987年托香港蕭國健博士從日本得縮微還原本，我親自逐頁描修，並作校補，1993年交由東莞人民政府影印出版。描修，校補，沒有一分錢報酬。

《花箋記》、《二荷花史》，是廣東俗文學木魚歌中的佼佼者，而書用了大量的東莞特有方言，可知是東莞人的作品，現在存世最早的兩書的刻本——康熙本、乾隆本，不在中國而在巴黎和倫敦。我非常感謝科大衛博士和程美寶博士，兩位專程為我遠涉重洋，把兩書的縮微放大本攜回中土。

我就是這樣，靠好友的幫助，從東莞本土、廣州、北京，而至國外，搜集東莞的地方文獻。

搜集東莞地方文獻的艱難情況，前年，我舉過搜集族譜一例，今再補充兩例：

1983年，我校訂《全芳備祖》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偶然發現抗清英雄東莞張家玉的詩文集（原無書名，姑名之葉編本《張家玉集》，抄本），較永曆刻本復抄本及其他幾種刻本、抄本為佳。其時我正承擔《嶺南遺書》編輯部整理《張家玉集》課題，得此佳本，為之狂喜。我已知北大圖書館善本室規定所藏之書，只能閱讀與校訂，不能照抄。於是我將葉編本《張家玉集》中詩文，分散抄於《全芳備祖》的校訂稿中。關館出門時，誰知要檢查筆記，我

夾帶抄錄的《軍中遺稿》中詩被檢查出來，管理員用墨筆一一塗去。我一旁看着，十分痛心，眼淚不禁奪眶而出，管理員見狀，說：「我很理解你，但這是規定。」雖然我已得張家玉著作多種，但留在華農，一時難至。我就心生一計，由抄錄改為背誦，每天背三百餘字。回住處後，工整地用毛筆默寫出來。歷45天，默寫完畢。我就堂而皇之，以另一版本拿出來校訂了。

例二：東莞有一位老先生，家藏東莞地方文獻頗豐，中多秘本。但秘不示人。我以通家之好，格外開恩允借。但一書借期，只能一天，明日七時，就要歸還。我已借閱數種，從不爽約。一次，借到明遺民梁憲《無悶集》，這是海內孤本（抄本），我想全抄，乞展展期而不允，我只請假一天，伏案疾抄，明日，晨曦初照，抄書畢矣。次年，老先生辭世，其藏書星散，幸當年抄存數種。為臨文所用。

二、利用

1. 利用東莞地方文獻研究東莞

利用東莞地方文獻來研究東莞是很自然的事，如：用所見的東莞二百多種族譜家乘寫成《東莞氏族源流考》（約35萬字，未出）。

【崇禎】《東莞縣志》，國內只有抄本孤本，藏廣東中山圖書館善本室，得中山圖書館大力支持，允許拍照，以拍照本為底本，用存世的各種《東莞縣志》為之校訂，1993年交由東莞人民政府排印出版。

明初，東莞陳璉是一位文學大家，其詩對廣東詩壇影響很大，其文是研究明初廣東歷史的重要資料。陳璉所著的《琴軒集》，通行本是《聚德堂叢書》的十卷本，得康熙刻的三十卷本以後，即自己動手描修，經三月乃竣，並從東莞方志、碑刻、族譜中輯出佚詩39首佚文32篇，共4萬3千餘字，作為附錄，隨即遊說陳璉家鄉東莞橋頭鄉影印（共印250套，每套5冊，已出）。

用《東莞張氏如見堂族譜》、《張文烈遺

集》、《文烈公集》、《名山集》、葉編本《張家玉集》、多種《軍中遺稿》等十多種東莞地方文獻，及《明季北略》、《東南紀事》等十多種史籍，整理出《張家玉集》收入《嶺南遺書》(1992年出版)。

用二百多種東莞的總集、別集、方志等書，校訂大型總集《東莞詩錄》(約300萬字，分7冊，第1冊即出)。

用一百多種東莞的總集、別集、方志等書輯編《民國莞詩》(約50萬字，在編輯中)。

2. 東莞地方文獻亦有助於東莞以外文化的科研

1977年，用《亭頭陳氏族譜》、《東莞詩錄》，補充《全宋詞》中陳紀的生卒年及其詞二首。

1981年用東莞檔案館所，我獲得《風岡陳氏族譜》(東莞北柵)，結合口碑，考證出我國蕃薯引種的最早之時(明萬曆十年，1582)，最早之人，最早之地。成我國引種蕃薯的最早的人，和引種蕃薯的最早之地，是中國農史研究上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

1985年我在《廣東荔枝小史》長文(2萬5千餘字)中，東莞荔枝栽培一節，用的是東莞地方文獻。

1987年寫成《廣東降雪考》長文(3萬2千餘字)，順治十三年(1656)樂昌、翁源、曲江、開建、大埔、興寧、揭陽、龍川、五華、惠陽等地的一場下了4天的大雪，各地方志都不載具體日期。我用東莞人張穆兩首詩，考證出一場大雪具體日期是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五相鄰數日。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廣州、番禺、南海「大雪霜，樹木多凍死。」下雪的月日不明，下雪的持續時間未記。康熙、雍正、嘉慶、民國等4種《東莞縣志》都失載。東莞《南社謝氏族譜》載：「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塘水堅冰，池魚凍死，林木凋謝。至二十三日方止。」可補東莞方志之缺，添廣州、番禺、南海三地方志之詳也。

80年代初被稱民族英雄的袁崇煥的籍貫，有過激烈的爭論，有廣西藤縣說，廣西平南說，廣東東莞說。我用袁崇煥自己認為是東莞人的材料：一，袁崇煥《重建三界廟碑記》(碑在東莞水南)、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二，袁崇煥的好友、幕賓、部下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的材料以這些為主要論據，寫成《袁崇煥籍貫考實》，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在東莞那位老先生處，抄得的梁憲《無悶集》，其《序》是難得的一篇屈大均論詩的佚文，王貴忱先生據我提供，收入《屈大均全集》。是海內孤本(抄本)。

用明東莞人王希文《石屏公遺集》卷上《重邊防以蘇民命疏》、結合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考證明正德初中葡屯門之戰中，將俘獲的四門佛郎機炮獻上明廷是何儒，仿製佛郎機炮首於東莞，製炮技術員是楊三。

廣東俗文學木魚書的佳作《花箋記》、《二荷花史》，我從二書中大量運用了東莞特有方言，證實二書是東莞人所作。《花箋記》自1927年鄭振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現現存最早的康熙五十二年淨靜齋刻本《花箋記》以後，75年來，海內外研究者大不乏人，但對評者鍾戴蒼為何許人，淨靜齋為何處書坊？均不得要領。我用【民國】《東莞縣志》、《東莞詩錄》、東莞橫坑鍾氏宗祠內鍾映雪《重修鍾氏祠堂記》考證出「戴蒼」為鍾映雪之字，淨靜齋是鍾映雪的書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康熙五十二年刻本，是鍾映雪的自評自刻本。

事例正多，不暇枚舉。

搜集、利用地方文獻多年，我的體會是：搜集地方文獻，不放過任何機會，跟蹤追尋。平時，博覽群書，勤為積累。正如陸游所說：「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功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